

冯桂芬教育思想述论

徐启彤

内容提要 冯桂芬一生长期从事教育活动,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他有力地抨击了清末腐败的科举制,提出了改革科举考试的种种方略。他的教育思想更为可贵之处是,他站在时代的前列,在继承经世致用思想的基础上,为振兴中华进行着艰难的探索,主张全面深入地学习西学和借鉴西方教育,而这些教育主张又处处可见其爱国热忱和民族精神。冯桂芬的教育思想对洋务教育具有开创作用,对维新教育则又产生了先导影响,从而开我国近代教育之先河。

关键词 冯桂芬 教育思想 科举制 洋务教育 维新教育

冯桂芬是近代杰出的政论家、学者,又是开创近代教育的著名教育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对洋务教育的创建和发展,对近代教育的兴起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甚至对几十年后的维新教育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冯桂芬虽然没有专门的教育著作,然而在其重要著作《校邠庐抗议》、《显志堂稿》中却保存了他丰富的教育思想,卓越的教育见解。本文着重探讨冯桂芬对旧教育的批判,对新式教育的倡导,以及对当时教育思潮所产生的推动作用。

一

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考中举人,二十年(1840)考中一甲二名进士。他初授翰林院编修,后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再充广西乡试正考官。他的一生除担任几年京官,以及组织过地方团练外,主要从事教育事业,特别是在吴地从事教育活动。他曾先后担任南京惜阴书院山长,协助李鸿章创办上海同文馆,并担任上海同文馆首任监院,还在上海敬业书院任主讲,晚年主教苏州紫阳、正谊书院,并任正谊书院山长,还曾受命主持或参与兴建苏州试院,重修吴县县学,改建正谊书院,重建吴江松陵书院等。

冯桂芬是林则徐的学生,“林一冯公以学问文章受知于文忠最深,有一时无两之誉。”他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的经世思想和社会改革思想,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于书无所不读,经史之外,天文、舆地、算学、小学、水利、农田无不精究,而尤谙于历代掌故。公于文无所不长,……而尤达于经世之学。”^①他丰富的教育实践,使他深刻感受到科举的腐败。他有力抨击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其批判之深刻,远超于同时代人的思想。那时热衷于科举者,整日熟读经义,埋头于八股时文,对于祖国的历史,国计民生,漠然不知,甚至置天下之安危、国家之存亡于不顾。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的《改科举议》一篇中,借饶廷襄等人之口,揭露科举制度:“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这就是说科举制度不过是举孔孟之旗帜,以笼络人心之方法,来达到坑害人才之目的。他说:“时文取士,所取非所用”,“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其实质是“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②。他进而指责科举

考试使“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销磨于时文、帖括、楷书无用之事”³³，本来聪明之人，也会一生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消磨在科举之中。冯桂芬曾感慨而言：“人生百年，少壮二三十时如日方升至禺中，实精气所凝聚，不以此时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为当时用，顾以其大有为之，岁月销磨隳坏于无益之途，终身莫之悟，则惑之甚者也。”³⁴对科举制度的揭露可谓深刻！

冯桂芬特别强调：“世之盛衰在吏治，治之隆污在人才。”³⁵他十分重视人才对社会兴亡的作用。他洞察清代末年嘉庆、道光朝以后，科举制度更为腐败，认识到那时“缪种流传，非一朝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穷变通，此其时矣。”³⁶变革科举制度已刻不容缓。

冯桂芬主张变革科举制度，提出过多种改革举措。首先是要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他对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对考试提出的“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的要求，极为赞赏，称为“诚哉是言”。他主张考试内容，从乡试至会试均应考经学、策论、古学三场：考经解（以经学为主）；考策论（以史学为主）；考古学（考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主张“凡国学，天下学校书院，皆用三事并试。”³⁷他认为只有经过这样几次严格考试，才能选拔出真才实学的人才。

广泛推举人才是冯桂芬改革科举的又一重要举措。他在全面分析古代以来选取人才的三种途径的不足之处后，特别指出时文取士的弊端：“专重时文，用科举之未善也。”于是提出在科举考试之外的广取士之法。他意通过广泛荐举之法，将诸如：“才德出众者”、“不遇公论称屈者”、“于岩处隐沦从不应试者”，以及“奇材异能别有绝技者”选拔出来，再经过必要的核实评议，照样可以“诸生赏举人，举人赏贡士，一体会试、殿试”³⁸。这是冯桂芬在认识到科举制度的腐败后，提出的一种类似乡举里选的推荐、选拔人才的方法。冯桂芬倡导这种选材的方法，并非走历史的老路，而是他在寻求民众意志和公平的意识。他虽然没有提出废除科举制，而是意欲采用此种方法，打破科举取仕的唯一途径。可以说，这是对科举制的一种否定，其用心十分良苦。

冯桂芬在充分认识到科举制的腐败后，则极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在这方面他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如李鸿章任江苏巡抚后，曾任命冯桂芬主持重建苏州正谊书院。冯在《改建正谊书院记事》中写道：“不知古来之学，本无不聚，后世名存实废之，学始不然而书院则转存古学之法，然所习仅科举文字，犹无当也，务令究心经史有用之学，无失文昭遗意，斯于古学法有合焉。”³⁹正反映了冯桂芬改建正谊书院的指导思想在于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从冯桂芬任正谊书院山长期间，所保存下来的《正谊书院课选》同治七年至十二年（即1868—1873年）的内容看，该书院已进一步发扬经世学风，注意联系社会现实，扩大授课内容，除经史外，已涉及当时的时事政治、军事、水利、天文、算学、地理等诸多方面。清末著名学者俞樾，在《校邠庐抗议》的序言中写道：“同治中余寓吴下主讲紫阳，先生亦主正谊讲席，……先生于学无所不通，而其意则在务为当世有用之学”。⁴⁰冯桂芬在为《惜阴书舍戊申课艺》所写的序中也极力劝勉学生匡时济世，经世致用：“余之谦陋何足资诸生楷模，顾窃有志焉，愿借诸生相劝勉于通经致用之途，不欲以流俗自画大之，考古今得失，匡时济世，坐言起行。”⁴¹这些正反映了冯桂芬不仅批判科举取士制度，而且在教学实践中十分重视倡导经世之学。

二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中华大地处于列强侵扰、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危险境地。冯桂芬身临其境，从而激发起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强烈要求自强雪耻的民族主义精神。他曾全面地提出改革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的思想主张。他的教育思想除了批判腐败的科举制度，

主张改革科举外,更为可贵之处,是继承和发扬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思想,进一步认识到全面深入地学习西学和借鉴西方教育的重要。他在充分意识到船坚炮利不如夷之外,还有在人才、地利、君民、名实四个方面不如夷,即“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⑩这是冯桂芬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看到了中国的许多不足之处,从而主张广泛学习先进国家的自然科学、生产技术和教育制度。

他深刻感受到人才的匮乏,是中国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中国缺少了解外国情况,能翻译外国书籍,懂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他说:“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此百国中,经译之书,惟明末意大利及今英吉利两国书凡数十种。其述耶稣教者,率猥鄙无足道。此外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未及。”这么多知识,偌大的中国竟无人翻译、无人知晓。于是,他在发出“中华大一统立邦而无之乎,亦学士之羞也”^⑪的呼喊后,便打破传统观念,尖锐地提出:“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⑫以这样的指导思想来学习西方,在当时的思想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冯桂芬认为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科技的重要途径就是教育,于是他特别提倡创建新式教育,设立新式学堂。他主张首先在上海、广东建立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廩饩,住院肄业”。还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教学模式:“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⑬虽然规定学习经史,然重点还是学习“诸国语言文字”,并且首先提出在这样新式的教育机构内学习算学。文中强调说:“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⑭这就把算学看作为十分重要的基础科学,其教育思想高出同时代人之上。

冯桂芬对西学的认识已远远超过魏源的“师夷长技”的范围。他说:“而历算之学,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冯桂芬对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亦十分重视,他举例说:“闻西人现用地动新术,与天行密合,是可资以授时”;再如,“闻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法用千匹马大火轮置船旁,可上可下,……)是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⑮可见,他把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科学技术的应用,皆列为西学的范围。他主张广东、上海两地的翻译公所对以上西学的书籍,可以“择其有理者译之”。这就把翻译公所的教学应用于学西学的实际,从而把学西学、设学堂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对于学生在新式学堂毕业后的出路,冯桂芬同样作了缜密的思考,有了比较周详的设想:“三年之后诸文童于诸国书应口成诵者,许补本学诸生,如有神明变化,能实见之行事者,由通商大臣请赏给举人。”^⑯这是一个大胆的思考,其实是一条新的升学之路。它改变了千百年来科举取仕的制度,在科举之外,另辟蹊径,学习西学,同样可以参加会试,可以获得授官的机会。这对传统教育思想是一个重要突破,一个有创见的发展。

正当冯桂芬为设想的新型教育机构绘制蓝图的时候,1861年奕訢出于清廷外交的需要,以“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不便对外交涉为理由,建议挑选一些八旗子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⑰。奕訢的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清廷的同意,清政府于1862年初即批准建立京师同文馆。清廷的这一决定,对冯桂芬教育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推动,对其教育思想的实施又是一个机遇。他在《校邠庐抗议》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瞄准有利时机,于1862年夏赶写了《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一文。看上去这是对清廷建立京师同文馆的一个响应,其实正是冯桂芬借清廷决定建立京师同文馆之机,来实现其教育思想,阐发其教育主张。

《上海设立同文馆议》，是冯桂芬教育思想的重要篇章。他在该文中首先对洋务教育的紧迫性作了颇有深度的说明：“今通商为时政之一，既不能不与洋人交，则必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情伪，而后能收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类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国政，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无其人。”冯桂芬将中外官员这样一对比，方显出清廷官员之腐败无能，清廷中外交涉之事，只得依赖于所谓“通事”（即翻译）。接着冯桂芬又对“通事”作了剖析，以为“通事”不外乎两种人：一是无业商贾，市井游民、无赖；一是列强培养之生徒。这两种人“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惟藉洋人势力，狐假虎威，欺压平民，蔑视官长，以求其所欲。”冯桂芬认为这两种人为洋务翻译，“遂为洋务之大害”。他强调说：“洋务为国家招携怀远一大要政，……其关系非浅鲜也。夫通习西语西文，例所不能禁，亦势所不可少。”通过冯桂芬这样的分析，清廷培养外语人才就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了。

冯桂芬在《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中，对京师同文馆作了理所当然的充分肯定：“聘西人教习诸国语言文字，与汉教习相辅而行，此举最为善法。”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能之者必多，必有端人正士，奇尤异敏之资出于其中，然后，得西人之要领而取之。”这正是清廷非常紧缺之人才。接着他又详尽地讲述了上海、广东两地对外交涉之重要：两地均为“洋人总汇之地”，“通商纲领，虽在总理衙门，而中外交涉事件，则二海口尤多。”这样就为其主张在两地模仿北京建立同文馆作了铺垫。于是，他说：“势不能以八旗学习之人，兼顾海口，惟有多途以招之，因地以求之，取资既广，人才斯出”。这几句话很重要，从理论上打破了八旗弟子对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垄断，应该通过采用多种途径办学的方针培养人才。他这里阐述的教育思想，不仅为上海、广东两地同文馆的创建寻找了理论依据，更为今后各地洋务教育的开办，确立了无可辩驳的理由。

冯桂芬在“多途以招之，因地以求之”的理由申述之后，便直截了当地提出：“莫如推广同文馆之法，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在上海、广州创办同文馆的理由已说清楚后，他遂将原先在《采西学议》中所设想的新式教育的模式和盘托出，主张将上海同文馆办成一所既学习西语西文，又兼习经史文艺的新式学校。此种新式学校，除了培养中外交涉的外语人才外，还培养科技书籍的翻译人才。他说：“西人之擅长者，历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皆有成书，经译者十之一二耳，必能尽见未译之书，方能探颐索隐，由粗迹而入精微。”这就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与翻译西方科学技术书籍联系起来，为引进西方科技创造了条件。

在冯桂芬的教育思想中，民族主义精神和爱国热忱成为主旋律。为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他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思索，精心设计着近代教育方略。他成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学习西方教育的佼佼者，力主学习西方教育，但又处处体现其爱国热情，有着发愤图强，绝不屈服的决心。对于中国的落后，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他则极为气愤地说：“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²³字里行间充满发愤进取之精神。而在讲到日本取得学习西方的成效后，即称“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²⁴又如对于学习西方的科技，他充满信心：“中国多秀民，必有出于夷而转胜于夷者，诚今日论学一要务矣。”²⁵对于创办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才更是成竹在胸：“我中华智巧聪明，必不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于水，青出于蓝。”²⁶可见，其怀有高度的民族的自豪感。再如，对学习西方的教育主张，则又抱着赶超的目的：“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²⁷真可谓在其教育思想中，爱国精神随处可见。

冯桂芬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充分反映了近代社会对新学人才的迫切需要,充分体现了创建新型教育是时代的重托。冯桂芬的教育思想在从事洋务教育、维新教育活动的开明官员和先进志士中引起过强烈反映,产生过不可低估的深刻社会影响。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完稿后,随即将这一包含重要教育改革思想的著作寄呈给清代显贵曾国藩。曾国藩如获至宝,“击节叹赏”²³。曾国藩在《复冯官允书》中亦颇为赞赏,认为该书:“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至其拊心外患,究极世变,则又敷天义士所切齿而不得一当者,一旦昭若发蒙,游刃有地,岂胜快慰。”又说:“自大著珍藏敝斋,传钞日广,京师暨长沙均有友人写去副本。天下之大,岂无贤哲窥见阁下苦心,而思所以竟厥功绪。尊论必为世所取法,盖无疑义。”²⁴可见冯桂芬的政治主张、教育思想早已在洋务官员、社会各界广为流传。

1862年李鸿章从安徽到达上海后,即将冯桂芬召为幕僚,成为其得力助手,为其献计献策。在李鸿章为冯桂芬撰写的《墓志铭》中讲:“有大政或遇事政,得所容度焉。”又说:“予既至沪,奏辟君自随,……又设广方言馆,求博通西学之才,储以济变,尝为予言。”²⁵同治二年(1863)二月初十李鸿章向朝廷上奏的《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和冯桂芬同治六年(1862年)夏所写的《上海设立同文馆议》的主要内容如出一辙,无大改动。看来李鸿章的奏稿可能是冯桂芬代拟,或李鸿章广泛地采纳了冯桂芬的意见,依据冯桂芬的《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一文改写而成。不管李采用的哪种手法,都可看出冯桂芬教育思想对李鸿章影响至深。

1863年3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创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简称上海同文馆(后改为上海广方言馆)。李鸿章在奏折中全面地讲明了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招生对象、课程设置、师资来源、毕业生出路等均作了具体规定。虽奏折中称仿京师同文馆之例,然奏折在诸多方面均有所突破。例如在招生对象上,上海同文馆打破了八旗弟子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的专权,规定“选近郡年十四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²⁶明确规定可以招汉人子弟,从此为洋务教育的广泛开展打开了方便之门。清廷则在李鸿章奏折推动下,命令广东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在招生对象上,就取消了仅收八旗弟子的规定,只讲“资质聪慧”,“质地尚可造就者,一并拣选。”²⁷再如毕业出路,李鸿章在奏折中也打破了科举制的一统天下,声明在学成后,可“作为该县附学生,准其应试”,或“酌给升途,以示鼓励”²⁸。如果说李鸿章的奏折中对毕业出路尚有含糊的话,则在对广东的上谕中更为明确:“倘一二年学有成效,即调京考试,授以官职。”²⁹这些可以说是洋务教育的重要发展,而这一发展的开端正出于冯桂芬的教育思想。

上海同文馆试办章程十二条,是首任监院冯桂芬拟订。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冯桂芬在章程中规定数学为学馆的正式课程,将算学与西文并列为主课,“凡肄业者算学与西文并须逐日讲习,”而“其余经史各类,随其资禀所近分习之。”可见规定同文馆讲授算学比学习经史更为重要。章程中还强调了算学在西学中所处的地位:“西人制器、尚象之法皆从算学出,若不通算学,即精熟西文亦难施之实用。”³⁰如前所述,冯桂芬在《学西学议》中就十分重视算学,把算学看作是一门基础科学,故在上海同文馆章程中如此规定,则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冯桂芬非但有这样的教育思想,也有这样的教育实践。他身体力行,对算学研究颇深,“于畴人家言研究尤深,著有《孤矢算术细草图解》及《西算新法直解》,校定李氏《恒星图》,测定咸丰纪元《中星表》,尝手制定向尺,及反罗经,用以步田绘图法为捷。”³¹冯桂芬如此重视算学教学,在洋务教育史上

应属首创,意义非同一般。

上海同文馆对数学教学的高度重视,很快便培养出一批既懂数学,又懂西语西文的人才。奕沂在奏折中对上海广方言馆进京考试的五名学生给予了肯定:“于算法颇能通晓,即翻译汉洋文字亦皆明顺,均无舛错。”^⑨朝廷经过激烈争辩,京师同文馆排除种种阻力,于1867年增设了天文、算学馆。这确实是洋务教育的又一重要发展。

李鸿章对冯桂芬的学识、思想很为敬佩,他说:“君子于学无所不窥,而期于实用,天下大计无日不往来于胸中,其于河漕兵刑盐钱诸政、国家条例、源流,洞达而持之。”又说冯桂芬“每一书成,远近学者争快睹焉。”^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同文馆,确实得到冯桂芬的有力辅助。李鸿章也坦然地讲:“采其议居多。”^⑪冯桂芬的教育思想对李鸿章洋务教育思想的形成,起了不小的引发推动作用。

洋务派重要首领左宗棠,出于对冯桂芬的敬仰,虽“头白临边,久荒文字”,仍为其子书写“家传”,其中讲到冯桂芬对李鸿章的辅助作用:“吴平李公开府吴中,就君咨访郡县利病,诸时政多取决焉。”左宗棠对冯桂芬的学识也极为称赞:“君著作甚富,堪裨实用,算学尤遯称于时。”^⑫可见冯桂芬倡导经世致用和对算学的研究,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学西学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探讨中学、西学关系的名言,后来竟成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教育思想的先导,乃至成为维新教育的重要原则,并被洋务派教育家和维新派教育家根据各自的理解,进行应用和发展,产生过深刻的社会影响。

洋务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张之洞,曾全面地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这一洋务教育思想。1898年他在一份奏折中讲:“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讥,亦杜离经畔道之弊。”^⑬他在《劝学篇》中又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并一再强调:“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具备,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⑭他特别强调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而将学习西方教育的内容局限在一个极为狭隘的范围之内,从而使洋务教育发展到一个极端,扼杀了它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的积极方面,仅成了维护清朝统治的一种教育手段,使洋务教育走进了死胡同。

一批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根据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的需要,纷纷提出改革教育的主张,形成早期维新教育思潮。他们也提出过中西学教育的教育思想。诸如,王韬提出的“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⑮,薛福成提出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⑯,郑观应提出的“融会中西之学,贯通中西之理”^⑰,等等。可以说早期维新派的这些教育思想,都是在冯桂芬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的发展和延伸,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救国家危亡以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要求,他们在深刻批判旧学的同时,极力提倡西学,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也讲“中体西用”,“中西学并重”,但其内涵与洋务派已大不相同了。梁启超对中西学的关系作过颇深的探讨,曾表述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⑱康有为对中西学的关系也说过:“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⑲从维新派对中西学关系的表述中,同样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与冯桂芬中西学关系的名言存在着继承关系。

维新派将冯桂芬的改革主张奉为维新思想的先导,康有为、梁启超都曾称道过《校邠庐抗

(下转第108页)

碑勒石,以彰乡里。宋代著名科学家、文学家沈括母亲许氏,为吴县人,沈括兄弟从小生活在吴县,许氏认真教育,严格要求,后来,沈括、沈扶兄弟都以吴县籍考中进士。明代木渎郭逢吉妻子潘氏,“通经书,略解吟咏”。郭逢吉官浙江巡按而病卒,潘氏年方28岁,其“备尝艰苦,课两绍箕、绍裘,以慈母兼严师,寒暑罔间,后二子成立并得官。”⁷⁷清代昆山“三徐”显贵耀祖,就归功于其母顾氏,她是著名思想家、大学者顾炎武的妹妹,据《徐氏家乘》记载,顾氏“性明敏,有远识。夫游学在外,综理家政,条理具备。训子极严。”“所读之书,必令背诵,师或他出,即亲为训读;常潜至书室听子谈论,如讲经史则喜,间或语博塞游戏事,即怒而责,至加忧楚。”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徐氏三兄弟“课诵恒至夜午不辍,”⁷⁸学业日进,早年即以文才闻名乡里,后以“同胞三鼎甲”名震全国。状元毕沅幼年失怙,全赖母亲张藻教育,张氏是位才女,人称清代“闺秀之能诗词而学术渊洁者,当以太仓张藻为第一”。⁷⁹毕沅6岁时,母亲就授教《诗经》、《离骚》。在母亲的教育下,毕沅10岁时已通晓声韵,能作诗文。之后,母亲又将他送到苏州师从著名学者、诗人沈德潜与著名经学大师惠栋,终于状元及第,并

成为乾隆朝的名儒重臣。张氏病逝后,乾隆皇帝特赐“经训克家”四字以褒扬。……正是在这些严师贤母的精彩教育下,一代名人脱颖而出。

苏州状元辈出,人才甲胜天下,固然离不开经济社会等外在的客观条件,但是苏州的家庭教育起了其他因素不可取代的作用,可以说它为封建时代的人才培养立下了汗马功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苏州的家庭教育有其自身的弱点,如以“读书做官”作为培养孩子的唯一目的,教育内容比较单一,主要是书本知识,而不注重能力的培养等。对此,我们要作历史的分析,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

责任编辑 许周鹤

注:

①载《教育研究》1991年第1期。

②周治华主编:《苏州全国之最》,江苏科技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

③《吴郡图经续记》。

④⑤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⑥《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四。

⑦《吴县志》卷七十四“列女·贤淑”。

⑧⑨《清稗类钞》“教育类”。

(上接第105页)

议》一书。戊戌变法前《校邠庐抗议》一版再版,直至变法期间,光绪皇帝接受具有维新教育思想的孙家鼐的推荐,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速印一千部,作为戊戌变法和维新教育的重要参考文件,分发给朝廷的各级官员。1897年维新派出版的《湘学报》上就曾说:“冯林一官詹《校邠庐抗议》,言人所难言,为三十年变法之萌芽。”⁸⁰也说出了冯桂芬思想主张和变法维新的源流关系。再有,维新变法期间,各地维新人士纷纷建立学会,宣传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1897年成立的“苏学会”,明确提出维新自强的主张,反对深闭固拒,力开风气,主张学习西学。苏学会在公启中声言:“往昔曾左诸公……赞成中兴,汲汲焉讲求西法;维时吾乡冯官詹有《校邠庐抗议》四十篇,其言灼见未来,洞中症结,海内通人所推许者也。”公启中要求苏学会成员“远师亭林有耻博文之宗旨,近法校邠采西益中之通论。”⁸¹可见,冯桂芬的教育思想,在维新变法期间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 许周鹤

注 ①《显志堂稿》,吴大澂序。②⑥⑦《校邠庐抗议》下卷,《改科举议》。③⑩⑪⑫⑬《校邠庐抗议》下卷,《制洋器议》。④①①《显志堂稿》卷二,《惜阴书舍戊申课艺序》。⑤《校邠庐抗议》自序。⑧《校邠庐抗议》下卷,《广取士议》。⑨《显志堂稿》卷三,《改建正谊书院记事》。⑩⑪《显志堂稿》,俞樾序。⑬⑭⑮⑯⑰《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⑱《校邠庐抗议》,《收贫民议》。⑲《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⑳《校邠庐抗议》下卷,《上海设立同文馆议》。㉑《显志堂稿》,吴云序。㉒引自《校邠庐抗议》光绪戊戌本。㉓⑳《显志堂稿》,《墓志铭》。㉔⑳《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㉕⑳《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四。㉖《广方言馆全案》第6-10页。㉗《清史列传》卷七十三。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九。㉙《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㉚《显志堂稿》,《中允冯君景庭家传》。㉛《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㉜《张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二。㉝《菴园文录外编》。㉞《筹洋刍议》。㉟《盛世危言》。㊱《饮冰室合集》,《西学书目表后序》。㊲《康有为政论集》,上册。㊳《湘学报分类汇编》,《掌故学第一》。㊴《知新报》,第33册,1897年7月20日。